

中国 有多 坏？

李希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有多坏？



李希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中国有多坏?
著 者 李希光
责任编辑 唐爱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5 插页 2
印 数 1—30000 册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265—6/G·699
定 价 2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你为什么还当中国人？（代序）.....	1
---------------------	---

第一部分：中国有多坏？

一、中国有多坏？	20
他们为什么讨论中国有多坏？	20
感到困惑的两张中国面孔	25
“解妖魔化”中国	29
“新中国”的背后	32
二、重读中国	37
摆脱陈旧的政治框框	39
与中国共存	41
认识中国：难解之谜	46
北京现场：中国的新政治	52
学习古老的中国	59
三、进入后天安门时代	65
白宫官员在北京三次坦言	65
“结束中国的冷战形象”	65
不再称中国为“极权国家”	67
美国进入后天安门时代	69
中美专家在华盛顿的 6 场讨论	72

开场白: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历史透视	74
第一场讨论:美国人如何看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	75
第二场讨论:中国人如何看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	77
第三场讨论:报道中国的实际挑战	80
第四场讨论:从事例看西方记者的兴奋点	82
——香港回归报道	82
——1996 年台湾海峡导弹危机报道	86
第五场讨论: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对政策和舆论的冲击	87
最后一场讨论:预测中国未来将发生的重大新闻	91
《天安门》制片人的回答	96
四、“不要相信你读到的中国的一切”	99
绝望新闻学	104
“他妈的!”新闻学	105
揭开“深喉”身世之谜	107
一个世界多种制度	108
五、中美记者对话录:道德与责任	116
美国记者的“闷闷不乐”	117
笼中鸟与井底之蛙	119
“我们美国记者没有道德责任”	121
“我最不愿干的就是当中国领导人”	122
“中国人总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126
“中国人不愿在公共场合洗内裤”	127
“新闻报道不应该在民族之间制造仇恨”	130
“西方记者是根据自己的假想报道中国”	134
六、美国媒体为什么对北大学生失望了?	140
“北大学生拷问美国总统”?	141
“未来要认真对付的是北大学生”	149

北大学生吐真情	153
这种情绪是人民大众的心声	155
七、亚当斯教授：结束媒体冷战	158
把陈旧的思想撇在脑后	158
改变天安门的固定形象	160
不要再错过中国的重大热点新闻	161
结束媒体冷战的迹象	166
中国传媒正在发生一场重大变革	167
观察一个新中国	169
八、中美军队互解妖魔化	173
九、“向中国敞开大门”	
——与美国右派保守组织领袖罗伯逊博士一席谈	
.....	184
十、在长城上采访克林顿	197
五个记者一张采访证	197
中美 30 名记者拥挤在一个城台上	200
“总统先生，请说几句话”	203
挖掘更精彩的引语	205
十一、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草根民主”	210
现场感受“草根民主”	210
“草根民主”的种子最初是如何播种的？	223
克林顿与“草民”闲聊“草根民主”	227
十二、与希拉里对话：中国开放精神的新迹象	
.....	235
美国记者：“中国迈向自由表达的新趋势”	235
关于挑战的自由发言	238
中国很多妇女不知道有个《妇女法》	244

卖驴的故事感动了第一夫人	246
--------------------	-----

第二部分：你为什么当中国人？

一、在新千年，中国人会依旧被称为中国人吗？

——四位西方学者访谈录	250
-------------------	-----

二、“我不是为自己活着”

——中国记者采访何祚麻院士	259
“要懂得怎么讲真话”	259
新闻报道要讲科学性	261
中国要不要搞马克思主义？	263
“我反对政治一体化”	265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在哪里？	267

三、“请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记者采访何祚麻院士	273
中国的氢弹是从第一原理做起	274
“你要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278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跟美国作战”	282
中美科学家就禁止核武器定期交换意见	283

四、“我不是新保守主义”

——与胡鞍钢博士谈国事	286
“我不是新保守主义”	288
从北大荒到耶鲁大学博士后	289
大胆发表独立见解	292
中国可能再次出现“贞观之治”	294
美国如何对待中国这样一个非西化国家的兴起？	296

民主化和专家化	297
中国面临的十大矛盾	299
五、无声的革命	305
电脑迷周光召说:不上网就没有出路	308
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310
一场无声的革命	312
数字墨水:挡不住的大潮	315
六、中国拥抱新经济	322
新经济核心人物来中国布道	323
中央王国进入网络世界	329
美国模式能否成为世界典范?	335
“不能简单模仿西方国家”	338
创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340
七、两个北京记者侃改革新闻	
——与《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马役军的对话	343
文字媒体记者在电视挤压下能否重新崛起	343
根深蒂固的“宣传味”模式扼杀记者的创新精神	347
把新闻写深	350
成功的记者:一要观察,二要谈话,三要广泛阅读	352
敏感问题,别人不敢碰,你敢去碰	354
记者最大的财富在于了解社会	355

第三部分: 背景材料

一、1997: 中国“妖魔”依旧	359
1997 年春天:妖魔化上升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主旋律	360

1997 年秋天:百闻不如一见	363
妖魔化的思想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需求	366
妖魔化的手段分析	373
妖魔化服务于什么目的?	382
美国传媒能否摆脱妖魔化情结?	388
二、1998:“新中国”千呼万唤始出来(于家娣)	
.....	396
永恒的主题	398
让中国站闪光灯下直播	410
阴暗心看香港	414
平常心看中国	417
对中国,媒体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424
多种声音的渠道	432
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客观性有多大?	434
美国媒体分析中国的质量如何?	438
影响美国媒体中国报道的因素是什么?	443
三、后冷战时代的“冷思维”	446
未名湖畔访刘康	446
冷眼向洋看世界	451
四、一家美国主流报纸编辑的来信	458
五、“你说出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463

你为什么还当中国人？（代序）

“你为什么还当中国人？”亚历山大劈头盖脸的问题差点把我给问住了。

1998年3月下旬的一天，美国《时代》周刊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打电话找我和我的同事熊蕾，说他的顶头上司、《时代》周刊国际版主编亚历山大约请我们在他下榻的王府饭店共进午餐。

据吉米介绍，亚历山大是首次来中国访问，吉米希望通过亚历山大的这次访问，促使《时代》周刊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报道中国，而不再仅仅是把报道选题凝固在西藏、台湾、宗教迫害和不同政见者等问题上。为此，吉米在北京通过他个人的关系，安排他的老板同他称之为代表不同思潮、但又敢于“直言不讳”的人士随便交谈，拓宽亚历山大对中国的认识面，进而在中国选题上拓宽报道面。

我开玩笑地问吉米：“你约了代表不同思潮

或利益的人士。那么你把我和熊蕃算成右倾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左倾的自由主义者？”

“都不是。你们属于务实的爱国主义者。”吉米认真地说。

“为什么这样称呼我们？”

“因为你们人近中年，有自己的头脑和成熟的见解，既了解中国国情，也了解美国国情。”吉米说。

在王府饭店二楼的中餐厅落座后，吉米拿起菜谱负责点菜，亚历山大则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开始了他称之为的“随便聊聊”。

“20世纪都快结束了，第三个千年将要到来了，你为什么还当中国人？当中国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亚历山大问我。

我愣住了。我活了38年，当了38年的中国人，相信中国人的身份是爹妈给的，是祖宗上传下来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记得去年国庆我带女儿去天安门广场游玩，女儿说：“爸爸，我都10岁了，从一岁开始，每年国庆节都带我去天安门，为什么国庆节我们一定要去天安门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为了让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有一个思考的时间，我反问亚历山大：

“在回答我为什么当中国人之前，请你先回答一下你为什么当美国人？”

亚历山大看来对这个问题早有思想准备。他说：“我为什么当美国人？因为当美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是，世界上有学问的聪明人都会讲美国话。而作为美国人，我们拥有的最优秀的东西是自由和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应该承认，许多人滥用这种自由，如出版有害儿童的色情书刊和在报纸上散布假新闻。我有两个孩子，我最担心的就是色情报刊，美国的孩子受到了太多的耳濡目染。关于资本主义，我们有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个经济制度下，金钱是那样重要，以致在美国任何能赚钱的东西都被许可。金钱正在

越来越成为我们文化的中心。过去很多人到我们国家来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今天，那已经不是很重要了，美国文化的基础是物质主义和金钱。”

当美国人最明显的优势就是语言。正如亚历山大所说，世界上有学问的聪明人都讲英语，而美国的聪明人无须专门腾出一生中几年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学习一门外语上，而直接把全部精力运用在发明和创造上。中国人要想进步和创新，必须把创造力最强的五六年用于学习一门外国语言。

“我为什么还要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我想引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诗来概括性地回答：‘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我说。

我给亚历山大讲述了几个故事。

1992年夏，我去漠北高原寻访汉武帝大破匈奴的古战场。在荒凉的杭爱山深处跋涉了一个月，穿过匈奴人的墓地和石头河大峡谷，跨越冰冷的依德尔，鄂尔浑河畔拜谒唐明皇亲笔题词的石碑《故阏特勒碑》，我们来到了漠北古道上的古镇——车车尔勒格。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镇的集市上，一个人从背后拍我的肩膀。

“你是打中国来的？”一个中年男子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带着浓重的河北乡音问我，“我见到你特别亲切。”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景良，老家在河北沧州。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17岁时趁乱偷乘火车跑到这里。刚来时在饭馆做饭，现在做些木匠活，没有任何收入。由于他不愿领蒙古护照，当地方政府动不动就把他给抓起来。

“我现在后悔当初跑到这里来，可已经晚了。我娶了一个蒙古姑娘，她给我生了三个孩子。但我还是要当中国人，我多么想得到一本中国护照。请您到乌兰巴托的中国大使馆帮我说个情，让他们给我一本中国护照。我当年跑出来，有一百个、一万个不对，可我还是个中国人！”

这个中年汉子说这话时，热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我还给亚历山大讲了苏武牧羊的故事。我要向他讲明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的浪漫而感人的文化，绝对不像亨廷顿和福山所描绘的那样是希特勒和法西斯的温床。

西方一些学者和记者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 20 世纪人类的一些暴行的根源，他们除了把法西斯主义和红色高棉与民族主义联系外，还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年代也与中国传统和文化相联系，试图借此彻底否定中华文化和历史。事实上，中国近代那些惨绝人寰的极端事件的发生不是根源于东方的文明或所谓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而是丧失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精神和文化传统“彻底埋葬”的结果（令人惊愕的是，当前一些西方传媒和学术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由，高喊要“埋葬亚洲价值观”）。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的精神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月里继续存有仁、义、礼、信、孝，如慈悲、忠恕、良知、恻隐、知耻、贵义等，能有那样的失去理性和人性的相互残杀吗？中华传统和文化寓托的是一个民族的教养、尊严和抵御外侮的力量，是修齐治平、安邦富国的理想，而绝不是孕育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的：“毛曾说过，中国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不必把 5000 年的历史当成包袱。但是，毛是一位天才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家，毛想入非非，企图废除中华文化之梦想造成了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动乱。”“中国今天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能力。这些能力虽难以解释却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这种能力便是一个注重知识、注重学习的文化所带来的成果。这种文化讲求办事高度认真，它是数千年来用复杂的汉字符号所代表的一种文明。这些特征有时被称为儒家风范。儒家思想根基于只向内看、向后看的传统社会。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经谈到过亚洲模式，即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沉静，更面向社会。和谐是这种模式

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准则。”^①

当中国人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 理想和凝聚力

为什么当中国人？因为当中国人是一种民族凝聚力。中国几千年来最终没有变成一盘散沙，靠的就是这种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这是几千年钢铁般铸成的民族魂。在当中国人这一民族精神的旗帜下，寄托着一种尊严和抵御外侮、抗御自然灾害的巨大力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无数次内乱外患，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它留在每个中国人头脑中的记忆是恐怖，大家希望安定团结，不要重演内乱。在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知识分子与自由民主和反叛相联系。而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中，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与爱国主义者认同。这种认同是西方记者和学者无法理解的。比如，我们从小从爷爷奶奶那里听到的《屈原沉江》的故事，特别是他留下的诗歌《离骚》痛斥了祸国殃民的小人，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对祖国的一草一木，都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又如苏武牧羊的故事，他在贝加尔湖牧羊 19 年，不忘父母国家，当他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回到长安时，全城的百姓都出来欢迎他，称他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国人道德性格的建构要素，这种民族的信念使整个社会的成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失去了这种民族精神，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勇气，失去理想，失去想像力，将变得多么没有诗意！

1966 年夏天，我在中国南方的一所煤矿的子弟学校上小学一年级，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作为这个煤矿的“头号反动技术权威”（总工程师）被遣送到贵州山沟里劳动，母亲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弄到一个砖瓦厂烧窑，七十多岁的奶奶给我做饭，照顾我上学。上二年级的时候，全班同学集体宣誓加入红小兵，戴红袖标

(就像今天的少先队员集体戴红领巾),而我由于父母的牵连,被拒之门外。每天放学或课外活动,红小兵排一个队伍,不是红小兵的另排一个队伍。由于全校就我一个人不是红小兵,所以,每次排队,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单独走。从7岁到13岁,差不多6年时间,生活在这种孤独、恐惧和任人奚落的环境中。我一直最担心的是怕我奶奶知道我的这种处境,怕她突然看到自己的小孙子遭到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歧视。但是,终于有一天,她站在家门口,看见一群放学的孩子在校长和工宣队的怂恿下,排队跟在我后面高喊一些只有那个年代才能喊出的侮辱性口号,奶奶气得要发疯了,她挥舞着拐杖,追着要打那群欺侮她孙子的红小兵。那群孩子嘻嘻哈哈地跑掉了,可奶奶从此却一病不起,不久就病故了。在那个极端的年代,父亲从遥远的山沟里,给我写信,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中华民族的美德,讲述苏武、张骞、司马迁、玄奘、李白、杨振宁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如何不为恶劣的环境所屈服的钢铁意志和最后取得成功的故事。也正是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支撑下,在那动乱的年月,我不仅没有沉沦,而是努力拼搏。1978年全国实行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时,我虽然是一个在偏僻荒凉的煤矿上出生和成长的煤矿工人,却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了大学。

“你为什么当中国人?”这个问题确乎不中听。很多中国人更愿意美国人说,你们中国人有3000年的历史,而我们美国人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人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而中国人是我们的老爷爷。我在多种场合听过一些客气的美国人这样对他的中国朋友说这种恭维的话。如哈佛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是这样恭维中国大学师生的。但是,当北大的那些听众在热烈地拍完巴掌之后,如果冷静地思考一下,可能就不会那么高兴和自豪了。因为谁都知道,婴儿有一个伟大的前景在等待着她,而一个老人至多是有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供他去回忆。

一个民族的复兴不在于她总是沉湎于辉煌过去的追忆，而是要有一颗不泯的童心。

作为一个关心祖国未来命运的新闻记者或是学者，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如何回答“你为什么当中国人”这类问题，而是要思考一下西方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有什么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这位美国记者先生的“直言不讳”。这同海内外某些批评家用那些“绕口令”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地介入现实要显得豪爽和直中命穴。

“你为什么当中国人？”一句简单的问话极富挑战性，从美国人口里说出来，有高人一等的味道。但是这句问话概括了文化精英们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为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和文化身份，苦思冥想制造出来的文化和政治一体化的绕口令，如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地理学、后殖民主义、后新时期、后学、新保守主义等等。根据这种观点，凡是对美国有益的自然就是世界性的政治文化，没有必要去顾及其他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这句问话具有潜在的危险假定。它把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全盘西化”视为不可避免，不顾中国面临的各种严峻的问题、挑战和危机，如失业、腐败、流动人口和缺乏社会安全体系，天真地认为中国会一夜之间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并按他们的体制和行为方式行事。

这句问话的另一个危险就是否定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否定民族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期望人们生活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里。但是，事实上，连美国自己在后冷战时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功能一点也没有减弱。如，为了维护其民族国家的利益，大规模地进入亚洲。而且美国在资源分配和保护民族的知识产权上，更是毫不含糊地维护国家利益。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指出

的,在美国学术界,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极端意识形态者,他们对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强调都是很厉害的,都是借文明谈政治。“经济全球化过程并不是用一种抽象的同质结构取代民族国家”。^②

亚历山大的这个提问反映了美国传媒、国会和宗教界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贯穿的强烈的道德主义,即把他们自己视为道德警察,并试图以此去改变和影响中国。但是,你如果想要中国融入国际对话,你的对话和问话都不要用一种侮辱和教训的口气。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把集体利益和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这与西方完全相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中国,姓在前名在后,因为名字是个人的。而在西方,个人的名字总是第一位的。写信封收件人地址,中国人总是按国家、地区、社区、街道、单位、个人的顺序写,把个人的名字放在最后。而西方总是把个人的名字放在国家的前面。

亨廷顿与福山

亚历山大的提问,生动平易地阐明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白人至上”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观点。亨廷顿批判亚洲的“非西方文化的复兴”时写道:

“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他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方向其他文明强加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③

“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和文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